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核心议题、评价及未来趋势

张 振

〔摘 要〕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之道,也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命题之一。学界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重要意义、基本经验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该重大命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针对既有研究尚需拓展的空间,学界应当不断创新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咨询。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党的领导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坚持党的领导”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十大“必须坚持”的历史经验的首位,并对百年来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总结。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这一重大命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力图在呈现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概貌的基础上,探究这一重大命题的未来趋势和研究走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提供科学的认识基础和必要的学理支撑。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核心议题

综观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重要意义和基本经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究。此外还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话语权和重点领域等相关议题也进行了研究。

张振,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逻辑及实践方略研究”(20AZD016)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学界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源头活水”，并重点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思想。一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研究方面，张世飞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斗争路径主要包含“思想的批判（理论）”与“实际的战斗（实践）”这两大类，其思想斗争主要体现在揭露宗教的本质、冲破旧道德束缚、理论武装群众等方面，强调只有通过思想批判才能“使尽可能多的群众在思想深处认同党的领导行为”。^①二是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研究方面，张振指出，列宁始终重视党对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不仅强调党对共产主义教育的领导，而且强调党要牢牢掌握文化工作领导权。^②李晓燕着重研究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指出列宁在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系统地创构了“灌输论”，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又创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对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③三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研究方面，朱继东认为，强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特性之一。^④汪洋系统归纳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涵，指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中之重。^⑤胡映兰指出，邓小平在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执政党意识形态思想，其中就包括强调执政党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反对“意识形态淡化论”，明确提出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搞精神污染，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⑥尤国珍指出，江泽民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在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同时，提出了如何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方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⑦龚正荣指出，胡锦涛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好坏与否决定着政权是否稳固，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⑧颜晓峰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有效维护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⑨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战略高度，对“面临新形势新需求新挑战，为什么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怎样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课题作出了全面的理论回答，为新时代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研究

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①张世飞、周明宽：《马克思恩格斯党的领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②张振：《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李晓燕：《列宁“灌输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④朱继东：《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中突出强调的三大特性及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⑤汪洋：《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探索》2018年第2期。

⑥胡映兰：《邓小平执政党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⑦尤国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回顾与思考》，《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9期。

⑧龚正荣：《论胡锦涛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的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⑨颜晓峰：《新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学习时报》2021年1月20日，第1版。

⑩于琛、张俊：《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思想的四个维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历史实践的分期及其依据研究。有学者按照党史的分期标准来划分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阶段,如韩强、刘成等将整个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进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至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至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年至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等四个时期。^①冯文燕则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初步形成(1921年至1949年)、破旧立新(1949年至1956年)、曲折发展(1956年至1978年)、转型探索(1978年至1992年)、深入推进(1992年至2012年)、强化提升(2012年至今)等六个阶段。^②另一方面,有学者按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及规律来划分阶段。刘欣然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为脉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探索可划分为开端(1921年前至1949年)、全面推进(1949年至2012年)与开创新局(2012年以来)三个阶段。^③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唐庆鹏指出,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并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④此外,冯留建等特别指出,这一时期党还尝试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实际、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指导中国无产阶级运动。^⑤胡伯项等通过对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考察,认为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已初具雏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实基础,凝聚了苏区斗争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⑥姜迎春认为,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凸显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突出了人民群众在新型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坚持唯物史观对正确认识历史和批判错误思潮的重要性。^⑦

三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刘成认为在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中国基本国情为依托,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革新,注重探索从革命思维向社会主义建设思维的转变路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向前迈进。^⑧王炎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通过建立直接领导文化宣传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能机构,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领导,从党政宣传机构、群众团体宣传机构以及运行机制方面着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宣传机制。^⑨朱斌、田克勤、刘洪森、李祥兴则另辟蹊径,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年画运动、冬学运动、戏改、外交政策等来创新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⑩

四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李君如提出,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以民生为价值取向,采取了学习教育、舆论宣传、典型示范、全员覆盖等灵活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大大提升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凝聚力与引领力。^⑪秦宣认为,改革开

①韩强:《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刘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进路》,《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冯文燕、洪向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过程及基本经验》,《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③刘欣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探索》,《求索》2021年第4期。

④唐庆鹏:《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⑤冯留建、孙海星:《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逻辑理路》,《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⑥胡伯项、蔡泉水:《论中央苏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就及启示》,《求实》2014年第5期。

⑦姜迎春:《论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⑧刘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进路》,《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⑨王炎:《试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与历史经验》,《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

⑩朱斌:《建国初期新年画运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建构》,《现代哲学》2018年第3期;田克勤、刘洪森:《探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和改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李祥兴:《论建国初期的冬学运动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⑪李君如:《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与媒体的作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路与理念不断拓展与创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生活化,拓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与手段,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不动摇,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协同性,并且不断与自由化浪潮进行坚决斗争。^① 张志丹指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为驱动和引领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精神引擎”、思想基础、理论前提与思想保障。^② 唐爱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解放思想这一有力武器,有效地推动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主流意识形态变革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拨乱反正”“自我建构”和“自我调适”等三个重要阶段。^③

五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朱继东认为“创新”是新时代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大特点,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加强党对思想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抢占传统和新型阵地的舆论高地,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理念、手段、基层创新。^④ 储峰等认为“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导向,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⑤ 韩庆祥指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必须要始终坚持党性这一根本原则,不断提升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功。^⑥ 姜迎春则从“整体性”原则出发,认为这一原则要求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需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融入“四个全面”的实践进程之中。^⑦ 姜辉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新时代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保障,必将对新的百年进程中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产生深远影响。^⑧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对党领导伟大事业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而且在理论上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内容,对该问题的论述主要从实践和理论意义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在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义方面,秦宣从历史视野出发,指出正是由于我们党重视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领导,提升了我们党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本领,为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光辉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成绩则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战斗力。^⑨ 李崇富等从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执政能力建设等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主流意识形态是党的重要执政资源,加强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是维护党的思想旗帜、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可以有助于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利益整合、力量凝聚和抑制不良思想和行为的作用,不断提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⑩ 崔庆君、张士海等从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互动关系出发,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促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成,引

①秦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②张志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③唐爱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选择》,《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④朱继东:《引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⑤储峰、张希中:《试析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人民性”》,《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⑥韩庆祥、鞠俊俊:《热话题与冷思考——做好意识形态“内功”:自觉主动构建“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⑦姜迎春:《论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整体性》,《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

⑧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红旗文稿》2020年第5期。

⑨秦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⑩李崇富、赵智奎、贺新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红旗文稿》2006年第18期。

导并校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发展方向,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成与发展反过来有助于夯实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提升党的全面领导能力。^① 张振认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确保了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原动力。^②

二是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意义。韩庆祥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③ 王岩等认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打牢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夯实意识形态阶级基础,增强文化国际传播力,才能批判与应对西方盛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④ 此外,龚云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特点与实质出发,指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从政治上重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有利于聚合全党全社会之力,持之以恒,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仗、持久战。^⑤ 张卫良等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生产既关注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具体价值,又关注人的超越性存在的终极价值,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这一根本立场。^⑥

(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研究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遵照“历史—现实”“理论—实践”的逻辑,学界围绕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向、坚持统筹意识形态建设与其他领域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是在“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这一基本经验方面,田心铭从党掌握意识形态建设领导权的维度出发指出,认真研究(意识形态领域)战场态势,认清双方实情,探求斗争规律,讲究战略战术,掌握党的政策,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是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策略。^⑦ 王永贵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维度入手,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宣传和科学灌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多种方法增加了意识形态吸引力。^⑧

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基本经验方面,有学者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战略意义,如侯惠勤指出,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之道,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始终严防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战略性颠覆性错误”。^⑨ 张志丹也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惊天动地伟大奇迹的“关键密码”,有助于不断提升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水平。^⑩ 有学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如孙绍勇认为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

①崔庆君、张士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成逻辑》,《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②张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百年基本经验》,《理论月刊》2021年第6期。

③韩庆祥等:《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与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专题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④王岩、茅晓嵩:《“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⑤龚云:《历史虚无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⑥张卫良、薛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逻辑理路》,《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⑦田心铭:《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1期。

⑧王永贵:《中国共产党90年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⑨侯惠勤:《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之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

⑩张志丹:《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

党掌握和驾驭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结合实际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起到了纲举目张的引领作用。^①又有学者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一角度出发,如蔡春玲指出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有效地促进了思想共识、凝聚了党心民心。^②

三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导向”这一基本经验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坚持意识形态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等两大角度加以提炼与总结。在“为了人民”这一角度,姜志强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跳出以往一切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上升时期真实、执政之后蜕化”的历史循环。^③崔庆君、张士海认为,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体系体现着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平衡和整体合力,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人民主体性与个人积极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④在“依靠人民”这一角度,秦宣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思想多层次性的客观事实,把先进思想教育作为主旋律,在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中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高全民的整体思想文化素质。^⑤王永贵则认为坚持人民性是党的成功密钥之一,体现在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既要把意识形态建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又要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⑥

四是在“统筹意识形态领域与其他领域建设”这一基本经验方面,张振认为,党在百年意识形态建设中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正确处理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聚焦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⑦李辽宁从意识形态建设与物质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党在经济社会取得的发展成就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从实践层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说服力。^⑧另有学者认识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与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着紧密关系,如费萍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从而在凝聚文化价值目标共识中为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精神动力。^⑨葛彦东认为,党不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以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能力的同时,党还注重通过培育时代精神、创作优质文化产品和创新文化活动等方式,积极营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环境。^⑩

(五)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其他重要议题研究

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实践、意义及经验开展研究之外,学界还聚焦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话语权建构及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等重要议题。

一是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研究。许志功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原则,其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本质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关键是坚持党的

①孙绍勇:《百年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的理路演进及其当代启示》,《湖湘论坛》2021年第4期。

②蔡春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③姜志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④崔庆君、张士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成逻辑》,《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⑤秦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⑥王永贵:《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境界——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经验和新时代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⑦张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百年历程、鲜明特征及其基本经验》,《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⑧李辽宁:《新中国70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⑨费萍:《中国共产党在凝聚价值目标共识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学术探索》2019年第10期。

⑩葛彦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2期。

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①朱继东则通过对古田会议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认为古田会议提出和正式确立的坚持“思想建党”原则,对于党在新时期应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局面、做好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②唐登然、陈昌凤和杨依军、杜旭宇等指出,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党管媒体、党管干部原则。^③张振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角度切入,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科学强化意识形态管理权、努力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等三大基本原则。^④

二是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权研究。有部分学者从建构意识形态日常化、大众化路径进行探讨,指出党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应当善于运用媒体文化,找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中大众认同的契合点。^⑤具体而言,就要立足日常生活转化话语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和力;优化传播媒介,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关注民生诉求,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话语权。^⑥王永贵、刘泰来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创设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前提条件,挖掘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增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内在动力,拓展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根本路径。^⑦

三是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领域研究。在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闻媒体领域方面,李玲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做好新闻舆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因此要坚持时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新闻舆论全链条全过程中突出党组织作用,在新闻舆论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⑧徐辉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指出我们党要继续研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中汲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策略,重视和发挥新闻传播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能,不断提升媒体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⑨在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方面,姜延军从党领导军队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出发,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民众(包括广大官兵)公共参与热情及渠道的拓展以及各种敌对势力“用心良苦”的设计和推动,党领导军队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复杂背景,因此必须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⑩任会芬着重研究了网络、新媒体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指出党既要把握好新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机遇,又要重点防范军队中“去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必须积极应对、因势利导,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创新,提升和建构党领导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语权,筑起军队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固堡垒。^⑪在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方面,黄旭东认为我们党要警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淡化的倾向,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本质,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与政治、历史性与时代性、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占领学术理

①许志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②朱继东:《思想建党原则与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红旗文稿》2014年第21期。

③唐登然:《党管媒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陈昌凤、杨依军:《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杜旭宇:《论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实现》,《理论月刊》2016年第7期。

④张振:《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学术界》2020年第9期。

⑤吴学琴:《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分析及其认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⑥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日常生活向度》,《理论探索》2013年第6期。

⑦王永贵、刘泰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⑧李玲:《新时代如何做好新闻舆论的意识形态工作》,《青年记者》2020年第36期。

⑨徐辉:《全媒体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导科学》2014年第20期。

⑩姜延军:《充分认清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背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⑪任会芬:《新媒体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去意识形态化”防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论高地,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① 孙立军认为,党要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科学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战略谋划、决策部署与顶层设计,努力形成由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制度、思想理论学习教育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制度等构成的具有整体性与联系性的制度体系。^②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评价

总体来看,上述主要基于党史文献和中央政策文本进行理论分析、经验总结和路径探究,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突破空间。

(一) 既有研究的重要贡献

一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谱系,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厘清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谱系是这一命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探讨,大部分学者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中撷取某一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或聚焦某一时期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研究,如建党百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等。可以说,在这些研究的相互串联基础上,基本勾勒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演进脉络和理论发展的大致图景,对党的领导与意识形态建设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无疑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构建了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进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发展,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同时学界关于党的领导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因此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应当与党的领导理论有机结合。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已探索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这就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研究进路。

三是多维度阐释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多个维度,从学理上阐释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对标国际格局演变、国内社会转型、生产力跃迁、社会思潮变动中,明确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直接关系到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执政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学界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多维阐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是提出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成果大多立足高远,从宏观上对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阐释,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领导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些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不仅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 既有研究尚需拓展的空间

一是既有研究尚需从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视野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进程。学界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某一历史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分析,在阐述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

^①黄旭东:《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牢固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②孙立军:《构建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阶段性特征时未能很好地关照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进程,所以从百年党史发展的全局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分析也需要立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唯有在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呈现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演进图谱,才能较好地剖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特征、内在主线、基本经验等问题。

二是既有研究尚需加大实证研究力度来精准把握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态势。学界现有研究中,理论性、宏观性的研究较多,但是实证的研究则较为缺乏,而且鲜有学者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领域开展实证研究,对党在具体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现状缺乏精准定位。因此,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全面领导需要加大对重点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实证调研力度,以更加精准把握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态势。

三是既有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可操作性和对策性的应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学界现有研究呈现出理论和原则要求的相关研究多,微观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建议较少,在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转化力上明显不足。特别是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在基层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意识形态建设则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未来趋势

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在研究深度、力度和广度,还是在研究的范式、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

一是创新研究范式,开展跨学科融合研究。从研究范式来看,学界研究应该注重通过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实现中共党史党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系统全面地阐释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属性、基本目标和结构功能。虽然部分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哲学、政治学、传播学乃至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用以分析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过程,也提出了若干路径选择,但已有研究成果大部分仍都侧重于党的领导与建设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从理论融合的视阈中开展该命题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不足,尤其是如何将党的领导与建设理论的“一般性”原理结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殊性”与“时代性”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性”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化。

二是创新研究内容,深入挖掘重点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全面阐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承续性逻辑和阶段性特征。诚然,已有研究成果基本勾勒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演进脉络和理论发展的大致图景,但是对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缺乏系统总结与梳理,大多数研究仍是梗概式、粗线条的;同时学者们在百年来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起点、演进主题等基础性问题上的研究尚需深入,对中国共产党“为何要领导意识形态”“能不能领导意识形态”“怎样领导意识形态”等问题在学理上尚未建构一个理论体系,尤其是揭示中国共产党与意识形态建设、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与党的百年伟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未深入研究。

三是创新研究视角,开展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学界应该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需要从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阐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当前,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很多,但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意义、价值目标、结构层次、内在机理、实践路径等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进一步深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史观,对于研究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界对此问题的阐发和论述大多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分析,“历史拼接感”过强,存在碎片化、割裂性,而鲜有将不同时期的理论阐释和领导举措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为相关理论研究留下较大的拓展空间。

四是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方法创新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加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双向结合,清晰展现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图景和重要成果。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阐释,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阶段发展和经验总结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基本经验不仅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一方面,学界应通过定性分析对历史发展中的经验规律进行高度凝练和总结;另一方面,学者们仍需要努力开拓新方法,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和手段对百年进程中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方式及其形成的重要成果进行系统呈现和展示,从而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新思路。

(责任编辑:陈 雪)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CPC's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ore Issue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Trend

ZHANG Zhen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found to be the way to the Party's success over a century, and it is also a hot topic attracting continuous academic attention. Academic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process, significance, basic experience, and other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CPC's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is major proposition. In view of the room for extend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continue to innovate the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PC's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CPC;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PC's leadership

About the author: ZHANG Zhen,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